

# 田野中的情慾

朱元鴻

「開在性這個領域，唯有到了今日才有可能探討」。這是性學家 Havelock Ellis 在 1929 年為其學生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野蠻人的性生活》一書作序時的評論。而馬林諾斯基在其《野蠻社會裡的性與壓抑》自序中強調：「對於性和人類許多可恥卑污虛榮的心理公開探討……我認為對科學極具價值」（Malinowski 1955 [1927]:6）。

在距今七十年之前，人類學者就已經強調了探究「性」的科學價值，而且已經對土著的性生活以民族誌田野觀察完成了人類學的經典著作。當然無庸我們在此後見誇誇這個主題如何重要，然而我們仍有興趣追問：在所謂田野觀察這麼悠久的科學事業裡，性的領域有些什麼是「即使到了今日還不便探討」的問題？甚至「公開探討」還可能具有重估所謂田野科學觀察的價值？

## 1. 沈默的結構

自馬林諾斯基以來，人類學的目光往往同時關注於「性」與「野蠻人」（sex and savage）。異鄉與異色（exotic / erotic）之間的差別，原本就很細微。人類學是致力於記錄與分析異族風俗習慣的科學，異族性生活的采風也就成為重要展示之一<sup>1</sup>。然而，相對於展示異

---

<sup>1</sup> Kulik 引述了一個對人類學工作有點冒犯卻歷久不歇的諷喻：“peeping through keyholes and broadcasting what we see there.” Kulik 陳列了人類學文獻裡性采風的

族性生活的科學成就，絕大多數民族誌研究者仍然絕口不提自己在田野過程中與性有關的經驗：無論是情慾或禁慾、有性或無性。相對於民族誌者觀察的異色田野，研究工作本身卻通常予人嚴格自律的印象。就如 Esther Newton (1996:213) 說的：「在研究所裡——因為從不曾有人提及——我學到，田野工作者與其報導人之間的情慾要麼不存在，要麼不正當，要麼不能被談論，而我不確知究竟是哪個？」甚至一套詳盡指引田野研究的手冊裡 (Ellen 1984)，也找不到任何有關「性」的索引標題。這並不是說人類學研究生就沒有學到關於情慾的田野倫理法則。這個不成文的、不能明說的、不受疑問的法則 (unwritten, unspoken, unquestioned rule)，Kulick 認為可以總歸為一個指令：不要 (*Don't*) (Kulick and Willson 1995: 10)。

然而，我們還是困惑「不要」什麼？不要有念頭？不要發生關係？不要記錄書寫？不要公開談論？——這是四種科學地位不同的自律方式，也各自有其值得探討的問題結構。當一個學科的田野工作者都以不具情慾意識的方式從事田野，那麼這種研究的知覺結構有什麼特殊意義？如果一個學科的田野工作者都在田野過程中嚴格禁慾，那麼這個貞潔結構是否也有其特殊意義？如果在田野中，研究者的情緒、情慾確實成為經驗的問題，那麼不可記述的秘密結構會是什麼？如果田野中研究者的情慾經驗，無論是成長歷練還是危機災難，不能公開談論，那麼這個沈默結構又意味什麼？

若田野工作者的情慾經驗仍然是個被包藏的「非論題」(nonsubject)，如 Newton (1996:213) 所形容的：這個沈默，「若非出於一項陰謀，也絕不會是個偶然」。晚近出現的兩個論文集：《禁忌：人類學田野工作中的性、認同與情慾主體》(Kulick and Willson 1995)，《田野現身：同性戀人類學者的反省》(Lewin and Leap 1996) 集結了廿二篇論文，算是開始對這個「非論題」的沈默結構提出了

---

成果：polyandry, puberty house, *baloma* conceptions, subincision, ghost marriage, ritual defloration, homosexual insemination, sleep crawling... (Kulick and Willson 1995: 3)。

一些聒噪的敲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客觀性所具有的沈默效應。人類學企圖成為對異族風俗習慣客觀記錄與分析的科學，而符合科學的客觀觀察假定了觀察對象的真實意涵不但先於觀察而存在，而且也不受客觀觀察的影響。如今願意承認這種天真實證論的人類學者或許不多，然而深植於這個觀點的科學想像仍然不願洩漏田野中被認為是不科學的、主觀的經驗。研究者的背景、位置被當作不相干，在正文中讓自己隱身不見，成為純粹觀察者；個人敘事的體裁受到輕蔑，被當作自我耽溺、瑣碎、異論，對於自己的情緒、情慾與性的討論更是犯禁。

當然，民族誌研究者自己就是蒐集資料的基本工具，學科的要求是進入田野，與研究對象一起生活，共同經歷生活中的情境狀況。但是這個預設，用 Rabinow (1977:4) 的話來說，有個之前 / 之後的矛盾：「當研究生時所受的教誨是：人類學就是經驗，直到你經驗到如何做，才算個人類學者。然而從田野回來後，卻發現事實上相反：人類學並非那所謂的經驗，有價值的成果只不過是帶回來的客觀資料」。主體經驗與客觀資料之間的矛盾，也說明了民族誌文獻的特殊體裁：個人敘事少有例外地出現在引言或第一章，記述作者如何初抵田野場址，遭遇什麼對待、艱難的語言學習過程、如何慢慢受到接納，以及最後離別時的失落感傷。這種慣例開場的個人敘事絕非偶然，而具有以主體經驗錨定權威的重要作用——我曾在那兒 (I was there)。此後進入客觀描述的正文，主體就必須退隱消逝，以確立科學的客觀性權威。這是民族誌文本權威的兩條腿<sup>2</sup>：無法取代的個人經驗——我曾在那兒；然後，文中描述分析的都是獨立於我的客觀過程——我隱身，沒有偏見、沒有影響、沒有情緒、沒有情慾，甚至沒有性別、沒有膚色。

這麼個抽離身體、沒有位置、不成問題意識 (unproblematic)

---

<sup>2</sup> 民族誌文本權威兩條腿的討論見 (Rabinow 1986; Pratt 1986; Clifford 1988)。

的觀察者，不僅只是個科學客觀性的迷思。Haraway 生動地表述這所謂的科學客觀性：

這凝視來自無處（nowhere）。這凝視神話般地銘寫於所有標誌了的軀體，使得未標誌的範疇宣稱能見的權力而不為所見，代現而不受代現。這凝視意味著白人與男性未受標誌的位置（1988: 581）。

從同志空間到教育空間

女性主義論述很切當的將這種抽離身體的、探燈般的凝視（disembodied, beam-like “gaze”）表徵為一種佔有（Kulick and Willson 1995: 269）。民族誌成就、人類學者生涯的度量，往往在於是否能讓他人開啟，透露秘密：巫術的配方、崇拜的祭物、內傳的神話、隱藏的儀式、私密的經驗…都可成為有價值的商品，但是這個凝視絕不反身透露自己。於是，超然觀察者與其觀察對象或報導人之間，沒有自我呈現與身份整飾（identity management）的問題意識。也因此，所有涉入關係與反身性認同建構的社會文化脈絡：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年齡歧視、階級、剝削、支配、恐同意識…也就在批判檢視的界域之外。

觀察者自我隱身的客觀形像，在過去廿年先後受到幾種不同但卻交織而來的批評質疑。女性主義對田野研究的批評質疑在客觀性要求之下將「學術」與「個人探問」（personal quest）二分的格局，鼓舞了以婦女為中心的研究主題，以她們的語言敘述她們的故事。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她們自己就是以相對於男性的「他異者」（other）位置發言。指向殖民主義的批判則檢視人類學知識論上的殖民主義遺緒，特別是民族誌書寫的體裁風格（Trinh 1989; Harrison 1991）。原本對焦於他異者的人類學凝視，開始轉向省察自己的社會與學科自身。最近，同性戀與酷兒也以理論與研究加入了論戰，特別為田野中的身份整飾、性與情慾貢獻了許多細微的主題。這幾種批評質疑有相互交織的脈絡。Newton 指出：

異性戀男性的性——無論在個人層次多麼困擾煩惱——是文

化「自我」(cultural “ego”)，是預設的主體性，而對女性與同性戀來說，性與性別卻從來不能是無問題意識的，因此可以理解，她／他們開始以這些議題向整個學科拋出質問(1996: 218)。

而在不同的脈絡裡，白人的、漢人的、或中產階級的性，也是無(須)標記的文化預設(unmarked cultural given)<sup>3</sup>。這些無標記的文化預設，就是沈默的結構：一方面預設的文化主體被置於批判檢視的界外，一方面以學術的不認識／不認可而繼續令某些主題緘默。例如反身性探討情慾或同性戀的主題，在學科內(教職、研究經費、發表)長期受到拒絕與歧視(Jacobs 1996)，即便在打破沈默的今日，這類主題是否受認可為「正經學術」仍不確定。

田野中的情慾之所以成為「有意義的沈默」，當然不僅是科學的問題，也是倫理的問題。情慾與性是自我的構成原則，界定了一個人的人格、品行，也深刻牽動了主體自身及其社會關係。田野中的情慾不但攪動了研究者自我的界線，有危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係的可能，模糊了學術角色與私人生活，更涉及種族與性別之間的權力、剝削等諸多質疑，是個困難而令人焦慮的問題叢結。然而將其蓋上不倫(unethical)的封印而掃到學科規訓的地毯下，仍然迴避了知識生產過程中許多必須持續批判探討的關鍵問題。

即使就倫理而言，「不要」(Don't do it!)——一個禁慾指令——也並非是毫無問題的。讓我們重讀馬林諾斯基的另類經典——《日誌》(Malinowski 1989 [1967])——來探討貞潔的結構。

## 11. 禁慾者的邪念

Friday 15. ...*Dirty thoughts (trying to struggle against them by thinking of E.R.M. <sup>4</sup>, but unsuccessfully) ...*

<sup>3</sup> 在作者關切的台灣娼妓研究裡，漢人、中產階級的性，是毋須標記的文化預設。

<sup>4</sup> E.R.M. 馬林諾斯基在家鄉的未婚妻。是馬林諾斯基在田野中對抗「邪念」或「骯

Sunday 17. ...*Only when you lack strength and dirty thoughts assail you—only then is moral stamina put to the test.*

Thursday, 4.19 [sic]. ...*A pretty, finely built girl walked ahead of me. I watched the muscles of her back, her figure, her legs, and the beauty of the body so hidden to us, whites, fascinated me... I was sorry I was not a savage and could not possess this pretty girl.*

Sunday, 5.5.18. ...*In the morning began to read Lettres des femmes, One of them very naughty, got on my nerves... I pawed Jabulona, and had guilt feelings... I must not touch a woman with sub-erotic intentions, I must not betray E.R.M. mentally...*

7.18.18... *The real problem is: why must you always behave as if God were watching you?*

—Bronisla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How colonial of me, I later thought: I want into their lives, but only as a voyeur.*

—— Deborah Elliston, ‘The Dynamics of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Talking Sex in Tahiti’

Raymond Firth，馬林諾斯基的學生與友人，在為《日誌》第二版序言時追溯了首版後廿年之間的議論與評價。這份當事人私存，無意發表的田野《日誌》，在遺孀的授意下出版，被視為一項背叛／出賣／洩密、侵犯隱私的出版醜聞。馬林諾斯基的友人與傾慕者尤其憂慮這項不名譽的出版將傷害馬氏的聲望，因為《日誌》暴露了馬氏的弱點，而這些弱點將在商業利用下受到公眾注意，或是對照出截然異於大師形象的負面印象，授予馬氏敵對者以話柄（Firth 1989, xxii-xxiii）。的確，過去廿多年來，《日誌》所暴露的「弱點」不斷受到仔細的檢視：對土著的惡感、時而爆發的脾氣、工作的偏執、情慾的誘惑與掙扎、焦慮自責、沮喪、厭倦、對文明世界的渴望想念…。《日誌》裡這些難以駕馭的人性，與馬林諾斯基 *Argonauts*

---

「慾望」時緊握的法器。雖然未必都靈。

(1922)裡科學呈現的事實，形成深刻的對比。James Clifford (1988) 刻意並列這兩份源出於相同田野經驗的文本，彰顯了其間對比的戲劇性：在 *Argonauts* 裡權威的參與觀察者、包容瞭解、冷靜客觀、嚴謹、寬大的作者，在《日誌》裡是看不到的；而《日誌》裡對土著的人情、慾念、嫌惡、種種曖昧的情緒，也是在 *Argonauts* 裡看不到的<sup>5</sup>。

Clifford 把 *Argonauts* 視為一個他異文化的虛構，而將《日誌》視為馬林諾斯基自我的虛構，強調《日誌》不應被當作田野真相的揭露，因為兩種文本都只是書寫的特殊嘗試，都不能窮盡田野的經驗 (1988: 97)。這種說法略過了一個問題——Clifford 也提到「《日誌》的出版曾為人類學的公眾形象引起了一件醜聞」(ibid.)——但是他沒有問：為什麼？Audrey Richards，馬林諾斯基另一位學生與友人，曾極力反對《日誌》的出版，在出版後卻發表一篇書評，努力導讀《日誌》的意義：馬林諾斯基是「anti-hero，因為沒有人曾像他那麼無情的坦白自己的缺陷」(引自 Firth 1989, xxiii)。但是我們不能忘了：無情的坦白原僅是保留給作者自己的，倒是一件被視為背叛 / 出賣 / 洩密的出版醜聞，才成就了一位值得欣賞的 anti-hero。我要強調的是，《日誌》之所以成為人類學史的一件重要文獻，並不僅如 Clifford 所言——因為它使我們了解田野遭遇的複雜性，任何文本都只是部份的建構——而在於使我們敏感到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經驗，或表達經驗的書寫，會遭到檢禁，有引起醜聞的危險？又為什麼？<sup>6</sup>

從《日誌》可以看出，就知覺結構而言，馬林諾斯基並非以沒有性意識的純潔心靈從事田野工作。如果這位父祖輩大師的民族誌研究可以作為典範，至少我們的學科規訓不再有理由以不具性意識的天真知覺結構作為預設或作為教訓。那麼，貞潔呢？《日誌》的

---

<sup>5</sup> 這兩份文本所源出的田野在時空上並非完全重疊，Clifford 選擇其中相對應的部份作對比，說明見 (Clifford 1988: 97-98, fn.4)。

<sup>6</sup> 這一段作者曾以不同的脈絡討論，見朱元鴻 (1997)。

戲劇性張力就在於「邪念」環伺之下的試煉。在行為上，我們讀到馬氏「粗魯的盤弄」(pawed) 田野中的女人。Newton (1996: 215) 更有欠恭謹的暗示：「或許不止」，並提醒讀者：《日誌》是經過馬氏遺孀檢禁過瀘之後才出版的。這個懷疑顯得很冒犯，然而我們卻無法否認。從田野經驗，我們發覺這是個任何田野工作者都可能遭遇到的有趣情境（或絕望情境，因人而異）：在當前關於田野情慾的秘密與沈默結構之下，當面對貞潔的懷疑時，無論以沈默或是聲明、否認或是告白，都無法祛除這個懷疑。『或許不止』，是個無止盡的好奇、想像或閒話。

Newton 不恭謹的閱讀，擺明了挑釁的姿態，質疑《日誌》出版後常見的防衛性評論：《日誌》讓我們知道了許多馬林諾斯基的「私人」點滴，卻不影響我們所認識的、作為社會科學家的馬林諾斯基。這些評論，將馬氏的情慾、健康狀況、對土著的乖戾、以及田野工作的焦慮不安都歸屬為「私人」(person) 範疇，與一個公開的社會科學家無關；或者認為可以將民族誌者劃分為高低兩部份，高層的是心靈、智識、(客觀) 意識，低層的是肉體、情緒、自我意識。Newton (1996: 216) 認為，這些評論都在整飾《日誌》對於人類學事業的深刻衝擊。而在首版時唯有 Clifford Geertz (1967) 的書評承認這個危機：《日誌》所透露馬氏的「私人」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鴻溝，沖毀了人類學自我表彰的形象。然而 Geertz 緊接著評論：至於馬林諾斯基則更值得欽佩讚賞，因為「透過科學鑄煉的神奇轉化」，他英雄式的超克了他對土著的惡念惡態而成為一個「卓越的民族誌者」。

神奇地轉換到一個「試煉」的脈絡，貞潔的懷疑，成為顯得很瑣碎的問題。無論東方或西方，深入 (penetrating) 處女地——唐僧取經的西域、人類學田野的蠻鄉——接受試煉的英雄都是男性，而魔障的代表則為女性<sup>7</sup>。事實上，早有人將馬氏譬喻為「在荒地受

<sup>7</sup> 這裡所指的不是生物性別，而是 de Lauretis 所說的“phallic position”。



試煉的神父」(the desert Fathers tempted by devils, 引自 Newton 1996: 216)。《日誌》於是被當作試煉的「精神告解」。Newton 敏銳地觀察到這種精神告解與與清教徒訓誨文集之間的相似，也因此，試煉過程裡的低層（肉體的、情慾的）經驗最終仍然統合於基督教訓誨的德行。我們也可以從唐僧西遊的試煉裡，看到東方宗教的類似版本。在試煉的脈絡下，確實，所有異族的情慾（主體或客體）都成了試煉的魔障，而所有反英雄的弱點、迷惑、失足，都成就了一位（我族）加倍可欽的宗教或科學英雄。

《日誌》的讀者對馬林諾斯基禁慾的掙扎提出了不同的詮釋。Hsu (1979) 認為這種抗拒出於種族與文化的優越感，隱含的層級關係使得他心理上難以接受「土女」為性伴。這種詮釋就《日誌》而言不無道理，然而卻難以成為通則的充分解釋，因為大多情況下，優越感未必會令白人或漢人男性迴避與「土女」的性關係。而且優越感與情慾的關係，對男性與女性的人類學者也分別呈現為不同的問題意識。Wengle (1988: 123-5) 為馬氏的禁慾掙扎提出的詮釋則為：在異文化的脈絡裡，他企圖保存自我認同，而性是自我的核心表徵。生活在異鄉，自我早已有模糊之虞，而陷於親密的性關係將是更大的威脅，因此他極力將性想念導向遙遠的家鄉，維繫一個認同的紐帶。當然，「種族與文化的優越感」與「企圖保存自我認同」這兩種詮釋是可相容的。確實，《日誌》裡馬林諾斯基保持自我純潔的情慾掙扎，所再三惕勵的責任感，是對遙遠家鄉未婚妻的，而從來不是對田野中成為他慾望對象的女人。這至少局部透露了他在田野中的主體位置。他所內化的禁制，那「猶如神在垂視」的神，至少不是個土著的神。

### III. 情慾身份

如果田野中關鍵的認同劃異是「自我與他異者」(the self and the Other)，那麼，為什麼田野中的情慾，就如 Wengle 說的：對於民

族誌者是個「喪失自我的根本問題」(‘the ultimate problem...of self-loss,’ 1988: 124)？借用 Jill Dubisch 的問句：

我們幾乎什麼事都與我們的報導人一起做：分享他們的生活、同餐共飲、加入他們的儀式、成為他們家庭的一份子、成為親密的朋友、往往建立終身的關係。而同時，我們為了自己的目的而「用」他們，藉書寫或言說而公開他們生活中個人的或私密的面向，為我們的學術目的而挪佔這些生活經驗。無論就哪個角度來說——親密、信守、或剝削——性關係又比我們與「土著」間這些通常關係，程度上有何更甚之處？(1995: 31)

再說，為什麼田野中的性關係就意味著「自我減頂」(self-loss)？減頂之後的自我又是什麼狀態？Cesara (假名) 是第一位公開書寫田野性經驗的女性人類學者，她在非洲田野工作期間分別與一位公務員以及一位地方官涉入關係，她以溫暖的筆觸描述這樣的關係使她「從一位人類學女生轉變為一位女人以及民族誌者」(1982: vii)。「在所研究的民族裡，透過對一位特定個人的愛與情緒，可以整體地把捉那個文化」，這樣的關係「為我開啟了 Lenda (族名) 的門扉... 我指的不是他為我引見朋友，而是他開啟了我的情感與心靈」(1982: 60-1)。

女性民族誌者在異鄉的田野一樣感到寂寞孤獨，而且有許多空間是她單獨無法進入的，在人身安全上也比男性更易受到性侵擾的威脅。Gearing (1995) 描述她在西印度群島聖文生的田野，在這樣脆弱的感受下，一位聰明風趣體貼又有魅力的男性報導人 E.C. 令她想要結合學術研究與個人情慾的念頭難以抗拒。恐懼村人輕蔑閒話原是深刻的焦慮，然而當性關係公開後，社會接受的正面回應令她意外，女性村人為她感到高興，男性村人則將她當作成年女人。除了社會接受與地位提昇，這個關係使她獲得深入聖文生情慾生活、性別、親屬與家庭各面向的洞見，這些經驗成為她博士論文的內容。隨關係進展，兩人結婚，E.C. 並隨她返美，成為「從田野中攜眷返鄉」的一例。然而這時，從朋友困窘遲滯的問候，與同事力圖掩飾

的狼狽，才令她覺察這樁美國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與第三世界工人階級黑人男性之間的婚姻，文化、種族、階級、性別的對比界線，在自己的社會裡要更為嚴峻。兩年後，由於 E.C. 文化適應的困難而離婚了，但兩人仍是合作與教養子女的伙伴。Gearing 在這篇十年之後的反省時表示：

做為女人而言，我與 E.C. 在田野中的關係是美好的，無論就情緒、性、智識而言都很滿足... 十年之後，我仍絲毫不懷疑我與 E.C. 的關係無限地豐富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研究。我從不覺得我們的關係是剝削利用或不合倫理的，那時不曾，現在也不會（1995: 203）。

Cesara 與 Gearing 都以相當正面的情慾主體經驗批評「自我 / 他者」、「我們 / 他們」的劃分區隔以及客觀抽離的假設。對「不要」的禁慾指令，提出了另類觀點。然而，我們仍須小心，這些成功故事並未充分呈現田野情慾的複雜情境與風險。

若「自我」並非一個必須力保純潔的恆常內容，而有可能經情慾歷練而成長，那麼，田野中的「他者」又何嘗只是個靜受觀察描述的客體？我們在進入田野不久，就領悟了與我們相處的村民在動機、操控情境的能力與意志上都是頗可觀的參局者（player），因此，無論「不涉入情緒的客觀抽離」或是「解消彼此界線的親密融合」都顯得是過於單純的圖像。實際上錯綜的情境中，角色與距離的界定需要細微的折衝手段與協商策略。經常，即使在熟識階段，研究者的身份仍會被遺忘、刻意漠視、甚至被迫重新協商。例如 Ruth Horowitz 回溯其芝加哥幫派社會的研究，就指出了一項常見的田野困境：在研究的初期階段，她被幫派兄弟敬稱為「報導女士」，在社交與探究問題上，享有比起「大哥的女人們」更為自由獨立的空間，然而在熟識後，對她的性挑逗、調情、邀約與性提議卻顯著增加，而幫派文化對於成員的約制也逐漸強烈地限制她的研究活動。在田野第十五個月後感到嚴重困擾，而在第十八個月被迫退出田野

民族誌者在田野中當然可以是情慾主體，但也經常——尤其是女性——可能成為情慾的客體，甚至因較高的教育、族群與身份而成為受追求的可婚對象。因此，一個虛構的婚姻身份——已經結婚或即將結婚的故事——往往策略性地用來迴避不想要的異性追求。有些女同性戀研究者，即使不很情願，也會運用同樣的策略 (Blackwood 1985: 56)。然而許多情境裡，虛構的身份故事未必能有效排拒異性的追求，有時需要以更深刻的身體策略，象徵性的標示自己 “sexually unavailable” 的身份。Morton (1995) 以她先後兩次懷孕說明了不同的身份整飾。在一次東加旅遊中，來自澳洲，未滿廿歲的 Morton，有意在異鄉異色裡「淹沒自我」，與一位東加青年熱戀結婚，懷孕生子，也真的體驗了沒有水電衛浴、沒有隱私、人畜昆蟲共處、姑嫂明爭暗鬥的東加婦女生活。這段婚姻在她偕眷返回澳洲後不久就結束了。七年後他以人類學研究計畫回到東加時，人們並不把她的研究身份當真，反而她離婚的身份卻受到東加男性比肩接踵的追求，然而年輕時令她迷惑的東加男性示愛方式，現在只令她感到嘲諷與不愉快。為了標示謝絕追求的身份，為了避免雙重誘惑、為了避免可能的性騷擾、為了錨定自我、為了與家鄉（澳洲）男友的紐帶，Morton 於是在計畫下受孕，以七週的身孕進入博士研究的田野。效果呢？據她說，當孕身可見之後，她逐漸受到已婚婦女的接納，身處於男性之間也更覺得安全可靠，不再感到性騷擾的恐懼，經常在涼爽的傍晚獨自到海邊散步，胎兒的父親不是東加人，恢復了她作為「外人」的身份，而與村中女性的關係從原來的性競爭對手 (sexual rivals) 或長幼序成為朋友與同黨，與婦女關係的開展對研究尤其是豐富的收穫。

在同性戀的脈絡中，田野中的情慾與身份整飾的問題意識，顯著的不同的於前述異性戀模式的貞潔、試煉或是婚姻、懷孕。對同性

---

<sup>8</sup> 這個問題作者也曾以另一個脈絡討論，見朱元鴻 (1997)。

戀而言，他們是異性戀世界的他異者，因此異性戀結構的人類學分類，例如他族的異鄉與我族的家鄉，是不屬於他們的隱喻。在異鄉裡禁慾以保存自我的純淨，保持與家鄉（我族）的認同紐帶，是不相干的假設。相反的，同性戀的田野工作者，同樣經驗身體與情緒的孤獨，然而異化的空間與其說是異鄉不如說是異性戀世界，因此唯有找到一個可以表達同性戀身份的空間，才能使異化的空間轉為自在的空間（a home）。因此，在田野中安置自我的方式，未必是掙扎抗拒異族情慾的誘惑，而或許是找到能夠共享情慾生活的同性戀伴侶。然而，如 Blackwood（1995）所分析的，縱令在異鄉田野找到同性戀伴侶，不同文化脈絡之下性別與性身份的範疇仍有許多差距，例如 T / 婆、butch / femm、cowok / cewek 並不全然對應，因此必須持續而細微的協商。而研究者在種族、社經地位的優勢，又可能成為性身份扮演的困擾，例如一位種族與階級優勢的婆在社交情境中可能造成 T 的困窘。而且，異鄉田野中的同性戀伴侶關係在田野結束後通常更難以保持，至少，無法像異性戀田野結緣的婚姻那樣獲得法律認可，以取得異族伴侶偕同返鄉的簽證。

事實上，在長期田野工作裡，研究者與報導人所發展出的情慾關係，無論是否進入婚姻，無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都是在田野社會特定環境之下的認同建構過程。若不說是創造一個虛構的身份，至少也是在田野生活中身份的順應或改編（adaptation）。而在離開田野返鄉之後，這樣的身份腳本卻會立即遭遇到自己社會度量極為不同的身份 / 劃異結構，因而成為難以持續或難以承受的負擔。這種困難，或許是「不要！」指令的一個理由。然而與其說不要有念頭，不要有關係，這項指令所規範的卻經常是將「私人的」區隔於「專業的」或「公共形像的」。於是，這裡的同事朋友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些什麼，那裡的報導人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些什麼。這個不成文的「不要！」與其說單純是個禁慾的指令，毋寧說是個祕密與沈默的結構，雙重身份之間的雙重整飾，同時維繫了自我形象與專業神聖感（理性客觀）。這個專業的隱身位置，也是個特別的情慾身份。

#### IV. 暫結

認同，無論是自我或是他者，並非恆常不變的內在。若自我認同會隨著田野的歷練而成長，那麼情慾經驗應該是與這個歷練轉化不可切分的部份。其實，無性、清純、貞節與情慾的活躍或魅力，同樣是自我呈現的方式，可以是研究者在變動的田野情境中的不同飾演（*personae*）。很難想像在田野中界定情境的細微較勁或相互關係的動態協商可以排除情緒與身體的涉入。當然，飾演的抉擇，仍然是個倫理問題，有若任何情境中的倫理抉擇，承擔了遭遇困局與矛盾的風險。然而依賴教條與準則，卻可能是倫理的退化或反動。例如，遵循「不要」的指令，未必是毫無問題的貞潔。在田野中，保持自我純潔不變的道德要求就如描述分析「他異者」卻不受研究影響的科學客觀性一樣，都預設了一個最終掌控（*final control*）以及能見而不為所見的主體位置。這不僅是研究者個人的位置，而是個文化上——種族、族群、階級、性別、年齡、性取向——未標誌的位置。

反身性的探問自己如何觀察他人，如何與他人互動，包括情慾關係，反省如何在田野過程中增進自我瞭解，其實意味著絕然不同的知識論與倫理觀。Haraway（1988）質疑科學客觀主義時，召喚女性主義的另類知識：局部觀點的情境知識。這是個知識倫理學的召喚。這樣的反身性探究的取向，被某些人類學者譏評為「凝視肚臍眼」（“*navel-gazing*”，Jarvie 1988: 428）。Kulick 在《禁忌》的編輯序言裡也覺察，反身性的研究主題有可能遭主流人類學者標籤為「自瀆的」（*masturbatory*）研究。我感到有趣的是，這些隱喻，在知識與書寫的層次，所相對的當然不是科學客觀性的「貞潔」，那麼是什麼呢？一個蒙面隱身的探／插入（*a self-effaced penetration*）？

- 朱元鴻，1997，〈背叛／洩密／出賣：論民族誌的冥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6期，頁29-65。
- Blackwood, Evelyn. 1995. "Falling in Love with an-Other Lesbian: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in Fieldwork",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Cesara, Manda [pseud.] 1982. *Reflections of a Woman Anthropologist: No Hiding Pla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lifford, James. 1988.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in J.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bisch, Jill. 1995. "Lovers in the Field: Sex, Dominance, and Female Anthropologist," in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Ellen, R. E., (ed.) 1984.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London: Academic Press.
- Elliston, Deborah. 1993. "The Dynamics of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Talking Sex in Tahiti," paper presented at session on "Methodologic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Sexuality,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vember, Washington, D.C.
- Firth, Raymond. 1989. Second Introduction to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aring, Jean. 1995. "Fear and Loving in the West Indies: Research from the heart (as well as the head)", in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Geertz, Clifford. 1967. "Under the Mosquito N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14: 12-13.
-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99.
- Harrison, Faye V (ed.) 1991.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 Horowitz, Ruth. 1986. Remaining an Outsider: Membership as a threat to research rappor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4: 409-430.
- Hsu, Francis L.K. 1979. "The Cultural Problem of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1-3: 517-32.

- Jacobs, Sue-Ellen. 1996. "Afterword," in Lewin, E. and W.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287-308.
- Jarvie, Ian. 1988. "Comment on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Texts'" by P. Steven Sangren, *Current Anthropology*. 29-3: 427-9.
- Kulick, Don and Margaret Willson (eds.) 1995.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Lewin, Ellen and William Leap (eds.) 1996.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55 [1927].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87 [1929].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Boston: Beacon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89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ton, Helen. 1995. "My 'Chastity Belt': Avoiding Seduction in Tonga", in D. Kulick and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 Newton, Esther. 1996. "My Best informant's Dress: The Erotic Equation in Fieldwork," in Lewin, E. and W.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ratt, Mary Louise.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and 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binow, Paul.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binow, Paul.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inh, T. Minh-ha.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ngle, John L. 1988. *Ethnographers in the Field: The Psychology of Research*. Tuscaloosa, Al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